

编者按

当我国正在意气风发地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也进入极为关键的历史区间。回首过去,辽宁曾创

造辉煌;展望未来,辽宁如何重振雄风?能否答好这一“时代之问”,事关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事关国家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的美

好生活。近日,记者带着振兴话题采访了多位一直关注东北、关注辽宁的国内著名专家学者,倾听他们理性的分析、客观的判断、中肯的建议。

打造向北开放最前沿

——专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本报记者 李越



迟福林

“在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辽宁迎来了新挑战,更面临巨大的新机遇。”日前,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辽宁应“跳出一域”,正视自身资源禀赋、基础优势,在东北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当“龙头”,在形成东北城市经济合作新格局中当表率,在推进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打造国内市场与东北亚市场的重要连接点,形成东北扩大开放的新优势。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校准坐标锚定未来

年轻时在辽宁有近10年工作经历的迟福林,对这片土地十分了解,也有很深的感情,“辽宁产业体系比较完备、供应链条比较完整,特别是装备制造有规模、有底蕴,实力雄厚,这些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不断积累的‘家底儿’是巨大财富。同时,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也给辽宁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了契机。”

迟福林认为,在开放的世界里,“双循环”是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参与经济良性发展的必然选择。既要能够巩固和发挥产业链的优势,还要有效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辽宁作为东北地区唯一既沿海又沿边的省份,有条件带动东北扩大开放进程,打造我国向北开放的最前沿,在对接东北亚区域合作中发挥重要的平台作用。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市场会有

大变化。辽宁的传统优势装备制造制造业会迎来需求侧的明显增长。”迟福林分析,此外,“低碳经济”等蕴含经济、环境、社会效益的产业,将带来新投资机遇和产业机会,都值得辽宁好好发掘和利用。

迟福林表示,从国内看,辽宁应在东北振兴中当扮演龙头角色。于整个东北而言,辽宁在产业结构布局、新经济发展、数字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处在重要位置,在多方面具有带动东北实现突破的可能。从国际看,辽宁在开放方面,尤其在东北亚地区的经贸联系十分密切。要用好这些条件,在对接东北亚共同发展过程中促进东北振兴。“总之,辽宁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具备比较好的发展合力。应立足大局,把握大势,正确分析自身的优势、潜力,校准定位,锚定未来。”

合理产业布局推动东北经济一体化

“双循环大背景下,任何地区想要谋发展,靠单打独斗都难以维系。唯有寻求一体化发展,才是理想方式。”迟福林表示,尤其是在疫情的冲击下,区域产业一体化的需求明显加大。全球可能出现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本土化趋势。辽宁所在的东北地区,是比较完整的地域经济综合体,更需要通过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在分工协作中推进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以东北经济一体化为东北振兴注入动力。

但这个过程中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迟福林说,尽管东北经济一体化已提出多年,但受制于自身的体制性、机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东北三省产业同构的问题仍比较突出,导致产业核心竞争力不强,企业成本居高不下。如何破题?应在产业链整合中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迟福林对全国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多年,他深感由于区域市场化程度不高,与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相比,东北三省城市之间经济联系不够紧密,没有形成错位发展的有效分工。他建议,应以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为主体,形成东北城市经济合作新格局。

“资源禀赋不同,地缘优势各异,不同地区必然会产生不同的产品,东北一定要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迟福林说,在工业领域,可推进东北制造的跨区优化重组,形成东北三省的纵向分工;在农业领域,可推进农业跨区合作,拉长产业链,推进农业与工业、服务业的融合发展。

“需要强调的是,这个过程中不是把已经衰败的产业和企业硬扶持起来,而是有效整合资源,主动作为,形成新的均衡发展的产业结构。”迟福林说。

三点发力将发展潜力变成强大动力

辽宁应抓住东北亚区域合作新机遇,以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为重点,在推进东北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打头阵,当先锋。迟福林表示,眼下,辽宁在制造业、服务贸易、基础设施一体化三方面均有发展潜力,好好开发利用,可将其变成振兴发展的强大动力。

“传统制造业方面,辽宁虽有基础,但总体还处于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低端,正处在转型升级中。”迟福林说,相比之下,日韩两国制造业大多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与东北地区制造业互补性较强。辽宁乃至东北,都应抓住中日韩推进自贸与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的重要机遇,实现产业对接。

迟福林判断,日韩的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和社会性服务业都比较发达,无论是从东北亚经贸合作趋势看,还是从东北振兴的现实需求看,服务贸易已成为促进东北亚深化区域经贸合作的重点,也成为东北地区加强与日韩经贸合作的重点。

基础设施一体化也是重要机遇。迟福林认为,中日韩三国地理位置相邻,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偏低,可以考虑推进中国东北、日本、韩国、俄罗斯远东地区沿海港口群之间的集装箱远洋干线业务、海内支线业务、国际邮轮业务的共同开发运营。还可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促进东北亚各国之间跨境大桥、跨境铁路和跨境公路建设,提高交通运输网络的互联互通水平。

当好东北振兴新突破的“开路先锋”

——专访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

本报记者 孙大卫



常修泽

“东北振兴,不只是东北自己的事情,是事关全局的大事。”日前,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东北振兴,辽宁是龙头,辽宁应当好东北振兴新突破的“开路先锋”。而辽宁要打一仗高质量发展翻身仗,需要重点从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方面破题。

以“大三观”视野把握辽宁振兴的总体格局

对辽宁,常修泽有着深厚的情感。1979年以来,他曾经80多次到东北,目前,他还兼任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正是基于对辽宁的了解,常修泽认为,辽宁振兴要从“大历史观”“大格局观”“大角色观”三个层面去看。

从历史视角看,常修泽指出,东北地区是昔日“海上丝绸之路”的最北端,肩负着打造新时代东北亚开放新高地的使命。

从世界格局看,常修泽强调,东北一直以来都是备受关注的重要区域。特别是疫情过后,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组,作为世界上复工复产最快的地区,东北亚具有独特先机。辽宁地处东北亚的区域中心位置,又拥有雄厚的产业基础和科教资源,机遇不言而喻。

从战略角色地位看,常修泽认为,东北地区承担着维护国家“五大安全”的重任,东北振兴是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解决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有着重要影响。当下,正处于改革“深水区”的东北,面对的都是“硬骨头”,

需要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攻坚克难。辽宁作为“老大哥”,要作出样子、进行示范。

从三个方面寻求辽宁振兴的突破口

在常修泽看来,东北振兴首先是辽宁振兴,想要振兴就需先看清楚问题出在哪里。经过多年考察他认为,整个东北也包括辽宁深层次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体制、产业结构等方面。

常修泽认为,体制方面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所有制和资源配置层面上。他表示,辽宁国企规模不小,但活力相对不足。民营经济有一定发展,但尚不充分。2020年公布的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96家,江苏90家,广东58家,辽宁只有8家。“体制机制不够完善,市场化程度不高,是其背后的主要原因”。

走出体制方面的束缚,需推进所有制结构变革。常修泽认为,“国”与“民”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针对实际情况,他提出,可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造,激活国企的活力,并通过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为民营中小企业打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

在常修泽看来,结构方面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和对外结构上。他表示,辽宁作为工业大省,产业门类齐全,但同时由于历史原因,产业结构相对单一,重工占比过大,资源依赖度偏高,而新增增长点却相对不多,新旧动能转换不畅。同时,外向型经济发展不足,地处东北亚中心的区位优势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常修泽说,摆脱结构方面的束缚,要切实推进新旧动能转换,要三措并举。第一条线,以“科智赋能”将传统产业的优势激发出来,并按高端、中端、低端分别采取不同的方式。第二条线:积极培育战略新兴产业,让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新型原材料产业等“俊鸟”高飞。第三条线:重视发展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东北

需要将过去那种以物质资源的“硬性”要素投入为主的发展模式,向服务等以“软性”要素投入为主的发展模式转变。

常修泽认为,解放思想要找准三个靶点:从计划经济体制和观念中解放出来,从行政依附中解放出来,从封闭和狭隘的眼界中解放出来。

以“金三角”支点打造辽宁振兴路线图

常修泽强调,振兴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不仅需要科学的设计,也需要脚踏实地的落实。振兴不是一蹴而就完成的,要有攻坚克难的韧劲。

首先,要念好振兴的“真经”。多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东北开出了一系列药方,打出了一套政策“组合拳”。辽宁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准确把握。

找准路径和方法,接下来就是“干事”。要给“不干事”的人撤板凳,让“假干事”的人没空间,别让光喊不干、搞形式主义、搞花架子的人影响振兴进程。

常修泽表示,振兴辽宁还要咬定“放”字不放松。他认为,“放”字主要包括四层含义:“解放”思想,从旧有的观念中跳出来;对下“放权”,用好市场的无形之手,把政府有形的手适当撤出来;“放活”企业,让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对外“开放”,努力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

振兴还需要找到发力的支点。常修泽表示,最重要的支点就是服务型政府、企业家队伍、4200多万人民群众,由此构成“金三角”结构。

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常修泽列出三张清单:负面清单、权力清单、责任清单。政府重在打造营商环境,搭建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

人是改革、开放、创新的核心要素,要注意提升对人才的社会尊重度,保护创新者和各类人才的合法权益。发展的最大底气是人民,要学会“去民之所恶,补民之不足”,办好关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大事”,这是振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三链”调整中获得更大发展空间

——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赵晋平

本报记者 唐佳丽



赵晋平

作为国研智库首席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赵晋平对辽宁的振兴发展一直十分关注。日前,赵晋平接受本报记者专访,他表示,面对当前形势,辽宁要把握住东北振兴的新机遇,利用好自身的既有优势,在改革、开放、创新上取得新突破,为促进地方经济与国际经济相互融合作为着力点,实现高质量发展。

辽宁面临诸多利好

“虽说疫情的影响仍在持续,但目前看,全球经济正处在逐步复苏中,在此进程中,辽宁面临诸多利好。”赵晋平认为,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功签订,中国和日本、韩国之间的FTA(自由贸易协定)取得实质性进展,都给辽宁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客观分析既有的传统优势,认真剖析正在兴起的新优势,在全球“三链”(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加快调整过程中,辽宁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从既有优势看,赵晋平认为,作为国家重要的工业基地,辽宁有雄厚的产业基础、优秀的产业工人、较强的科研队伍。如今,数字经济正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新动力,数字要素创造的价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工业互联网与产业数字化提供了关键基础设施支撑和产业生态基础。“辽宁的这些‘家底儿’,为其在数字经济领域有所作为,提供了必要条件。”

“此外,东北亚区域合作取得进展将使东北地区成为直接受益方,这

也是新发展格局下辽宁的优势之一。”赵晋平分析说,辽宁地处东北亚中心区域,具有天然的地缘优势。同时,在长期的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过程中,大量日本和韩国企业已经到辽宁地区投资,在俄罗斯、蒙古、日本、韩国开展经贸活动的辽宁企业也不在少数,形成了企业相互投资带动下的资源要素集聚的东北亚区域生产网络。与国际市场深度融合,辽宁已经在经贸制度上具备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用改革打破制约发展的障碍

着眼未来,赵晋平认为,东北地区应将对外贸易和数字经济相互融合,培育数字经济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尤其是辽宁,要注重培养引领产业发展的龙头企业。对此,辽宁要以改革为先,开放引领、创新驱动,来实现更大力度的突破。

赵晋平认为,当前全球经贸规则正在重构,作为市场竞争的参与者,在辽宁,不论是国企还是民营企业,面临的挑战都是巨大的。目前看,相对于国内其他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来说,辽宁企业发展相对滞后,这与辽宁市场化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企业欠充分发挥市场活力的制度和政策环境有关。制约发展的制度性和政策性的障碍,必须靠改革去打破。

赵晋平认为,当前全球经贸规则正在重构,作为市场竞争的参与者,在辽宁,不论是国企还是民营企业,面临的挑战都是巨大的。目前看,相对于国内其他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来说,辽宁企业发展相对滞后,这与辽宁市场化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企业欠充分发挥市场活力的制度和政策环境有关。制约发展的制度性和政策性的障碍,必须靠改革去打破。

“辽宁在转型升级上,以及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最紧要环节上。只有这样,辽宁才能培育出自己的头部企业。通过它们来引领整个地区的创新环境建设。”

城市间协同融合发展

从今年一季度统计数据看,辽宁经济运行稳定恢复、稳中向好,主要经济指标全面增长。“这样的发展,也为辽宁促进地区间平衡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在赵晋平看来,辽宁振兴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在龙头城市的带动作用下,各地区都能够得到快速发展,所以,辽宁还需加强地区间协同发展。

协同发展,要在推动国内国际市场融合发展中完成。赵晋平认为,对于辽宁的市场主体来说,国内国际市场融合带来的商业机会和发展空间是巨大的,这意味着要素整合的成本降低和效率提升。辽宁企业要抓住东北亚区域合作取得重大进展的有利时机,通过参与与经济区域一体化进一步拓展市场空间,深化和周边国家、地区之间的经贸关系,为企业创造更加开放和高效运行的市场环境。“立足新的合作机遇和良好外部环境,推动自身改革和扩大开放,辽宁的企业就能更多地分享国内外市场深度融合带来的好处。”

提到协同融合发展,赵晋平还强调要推动地区间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融合发展,以及辽宁各城市间的产业合作发展。他认为,制造业的服务化是现代产业业态转型的一个新趋势,跨境贸易形态也在不断向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相互融合的方向升级。

疫情过后,服务贸易有可能继货物贸易之后快速反弹,并进入持续较快增长阶段。赵晋平建议,包括辽宁在内的东北地区应该利用现有的资源禀赋及制造业方面的优势,促进跨境支付、境外消费等服务贸易发展,其中,旅游、冰雪体育休闲、电信、运输、文化服务等特色服务贸易,今后可能会出现快速回升。

合力开启创新之门

——专访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梁颖达

本报记者 孔爱群



梁颖达

“辽宁在创新上有潜力,有机遇,只要产学研能够携手起来,形成合力,再从顶层设计上解决好动力源和活力源问题,辽宁就能够得到快速发展。”

不久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梁颖达到辽宁调研,并接受本报记者专访。他表示,此次来辽宁,对老工业基地有了很多新认知,在科技创新上,辽宁既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也存在短板和不足,重在找准症结开方抓药。

梁颖达说,在辽宁科技创新“战场”上,无论是一线科研人员、科技管理人员,还是科技服务工作者,对于创新都充满了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这令人印象深刻。有这种劲头,不愁走不好创新路。

挖潜力

“进入新发展阶段,东北、辽宁建设创新型省份潜力巨大。”梁颖达说,新中国成立之初,辽宁就是非常重要的工业基地,拥有雄厚的产业基础。那一时期,以辽宁为代表的整个东北老工业基地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自身也形成了很好的基础和优势。“辽宁产业体系完备,科教资源丰富,有高校114所,中科院驻辽科研院所6所,国家重点实验室14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2个,两院院士达56人,研发实力排名全国前十,这都是辽宁科技创新的最大底气。”

梁颖达认为,产业上,除了原有的装备制造等方面,辽宁在新领域也进行了非常有益的攻关和探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比如在智能制造、

新材料、清洁能源和生命健康等领域,辽宁不仅承担着国家重要战略任务,也推出了一些重大科研成果。尤其是去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期间,辽宁启动实施4批共40项应急科研攻关项目,攻克核心关键技术21项,自主研发高端防护用品37项,充分体现了“长子”的担当,为全国战“疫”提供了科技支撑,贡献了辽宁智慧。

“作为战略重地,国家对东北振兴高度重视,科技部专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 支撑创新驱动东北东北地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并在创新能力培养上给予东北包括辽宁在内很大支持。像项目经费、平台建设、体制机制设计、先行先试等,都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举措。”梁颖达希望辽宁能借力国家支持,结合自身特点,把中央对科技创新的相关要求落到实处,把一项项政策变成具体行动,提升能力,做强经济,为东北振兴贡献“最大增量”。

强动力

辽宁的科技创新,最重要的是解决好动力源和活力源问题。梁颖达坦言,与发达省份比,辽宁的这两个“力”,尚显不足。

近几年,东北人才“东南飞”现象较为严重。而人才是创新的核心要素。“优秀的科技人员越多,科技创新的队伍越强大,能够做的事情就越多,创新能力也就越强。”在梁颖达看来,辽宁要留住人,让人才有创新创造活力,就得得多给他们营造热爱创新、热爱科技的浓厚氛围和良好环境,这需要从政策、法律、文化等方面着手推进。

聚合力

“在创新上,辽宁‘家底’殷实,不缺资源、不缺要素,更不缺创新基因。只要解决好产学研结合问题,能够在创新上打开新局面。”梁颖达说。

“辽宁创新,先要做好顶层设计,这个设计要保证战略性和长远性。”在梁颖达看来,科技不是孤立的,需要各方齐发力,通过建立创新平台体系,让各个创新主体充分发挥作用;协调好基础设施、国家重点实验室、创新中心等大小创新平台,形成合力。同时做好资源配置。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联盟很重要。”梁颖达说,辽宁的一些大型企业有科技基因,应该让这些大型企业真正当好创新龙头,带领高校、科研院所以及一些小微企业和新型研发机构,针对市场需求,形成技术创新的联合体,围绕产业链,建立创新链。

对于辽宁成立东北科技大市场这样的服务机构,梁颖达表示赞赏。“科技成果要变成现实生产力,离不开科技中介和服务机构的发展,多进

行这方面的探索和尝试,有利于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

在梁颖达眼里,沈阳和大连是传统的北方强市。“辽宁可以依托这两个城市打造技术创新高地,形成科技资源的聚集地,利用自主创新示范区和高新区,汇聚高科技企业和高端人才,让更多的科技创新资源流向这里,引领和带动全省提高创新能力和水平。”

“动力靠供给,而活力在培育。”梁颖达表示,广大科技型中小企业是创新的生力军,对创新最迫切也最积极,但辽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创新能力上都与发达省份存在较大差距。这就需要厚植沃土,重点培育。拥有足够数量的科技企业,创新就有了“源头活水”。

“世间最伟大的力量就是同心合力。辽宁若能在创新上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则无往不利。”梁颖达如是说。